

从满文寄信档看乾隆朝对新疆藏传佛教的管理*

郭益海**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内容提要] 在平定准噶尔部叛乱过程中,清朝不断加强对新疆藏传佛教的日常管理。从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来看,主要记载了有关藏传佛教寺庙新建修缮、喇嘛日常管理、土尔扈特部进藏熬茶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史料为进一步了解清朝在管理新疆藏传佛教上的基本态度、基本策略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撑。

[关键词] 寄信档 乾隆朝 新疆 藏传佛教

[中图分类号] K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67(2022)02-0055-11

目前有关新疆藏传佛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对《清实录》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史料的挖掘运用比较充分,但是对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使用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是目前可见的最早满文寄信档,其所载寄信极具代表性。从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来看,有关新疆藏传佛教的记载主要涉及藏传佛教寺庙新建修缮、喇嘛日常管理、土尔扈特部进藏熬茶等方面的内容。整理研究这些史料,为进一步了解清朝管理新疆藏传佛教的基本态度、基本策略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照蒙古之例设立喇嘛

乾隆时期,清政府在新疆设立喇嘛,主要是用于诵经消灾祈福和祭拜山川。

设立喇嘛诵经消灾祈福。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一月,根据伊犁将军明瑞奏报,伊犁地方“稍有瘟疫”^①。同年十一月初七,乾隆帝谕示明瑞:有类似情况时,“应由喇嘛等作法,诵经驱邪净土。”^②明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锡伯语(满语)基础语料库建设与研究”(15ZD131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郭益海(1979—),男(汉族),宗教学硕士,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从事新疆宗教历史与政策研究。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29-5-024,寄谕伊犁将军明瑞著派喇嘛到伊犁安置并修缮固尔扎庙,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29-5-024,寄谕伊犁将军明瑞著派喇嘛到伊犁安置并修缮固尔扎庙,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确了设立喇嘛及其职责。此外乾隆帝还考虑到“伊犁既有厄鲁特人等,若安置喇嘛,于其颇有裨益”^①。但是,乾隆帝表示“唯不知现在伊犁是否有喇嘛”^②,因此特传谕明瑞:“彼处若有喇嘛,即令伊等作法诵经驱邪净土;若无喇嘛,则从京城挑选数名喇嘛,亦为不难,明瑞等即刻奏请调取。”^③

乾隆帝不清楚此时伊犁是否有喇嘛的主要原因,与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过程中伊犁当地喇嘛的消极表现有直接关系。乾隆二十年(1755年),阿睦尔撒纳叛乱,他派遣固尔札寺喇嘛为使前去见班第将军,该喇嘛使者公开威胁:“若不使阿睦尔撒纳主伊犁者,喇嘛等当自刎死。”^④乾隆帝认为,“此番伊犁扰乱,半由彼处喇嘛等从中助恶。”^⑤和康熙、雍正两朝态度一致,对参与叛乱的喇嘛,乾隆帝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应将喇嘛中起意倡乱之人,即行正法。其情罪稍有可原者,量从宽典。”^⑥平定叛乱之后,清政府随即对伊犁喇嘛进行整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基于对准噶尔喇嘛“断不可信”的判断,将“未曾助恶之喇嘛”尽数解送来京。^⑦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月,乾隆帝再次谕示伊犁将军明瑞“应照蒙古之例,设立喇嘛”^⑧,举行送巴凌^⑨、放乌布藏^⑩等事。可以在伊犁原有的固尔扎、海努克两座寺庙中“酌修一处,选喇嘛百余名入住,每月拨给钱粮口米”^⑪。遇有放乌布藏、送巴凌等佛事,即可用之。这样“既不废蒙古礼俗,且于地方亦有益。”^⑫对于喇嘛人选,除了可以在伊犁现有喇嘛中挑选之外,也可以考虑当地蒙古人中情愿当喇嘛之人。如果喇嘛人数仍然不够,可以由中央政府“另行拨往”^⑬。

有关喇嘛诵经消灾祈福事宜,在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中还有其它地方的相关记载。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苏尼特两旗地方接连两年遭受旱灾,蒙古牲畜倒毙甚多。同年七月初一、初二连续两天,乾隆帝谕示察哈尔八旗都统乌尔图纳逊,令其召集当地大喇嘛诵大云轮经祈雨。^⑭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29-5-024,寄谕伊犁将军明瑞著派喇嘛到伊犁安置并修缮固尔扎庙,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29-5-024,寄谕伊犁将军明瑞著派喇嘛到伊犁安置并修缮固尔扎庙,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29-5-024,寄谕伊犁将军明瑞著派喇嘛到伊犁安置并修缮固尔扎庙,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④ (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8,《驻劄大臣原始》,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12页。

⑤ 《清高宗实录》卷499,乾隆二十年十月乙丑。

⑥ 《清高宗实录》卷500,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丁丑。

⑦ 《清高宗实录》卷537,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丁丑。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0-1-002,寄谕伊犁将军明瑞著伊犁地方亦照蒙古之例设立喇嘛并祭拜山川,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初三日。

⑨ 讲经说法。

⑩ 灌顶。

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0-1-002,寄谕伊犁将军明瑞著伊犁地方亦照蒙古之例设立喇嘛并祭拜山川,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初三日。

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0-1-002,寄谕伊犁将军明瑞著伊犁地方亦照蒙古之例设立喇嘛并祭拜山川,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初三日。

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0-1-002,寄谕伊犁将军明瑞著伊犁地方亦照蒙古之例设立喇嘛并祭拜山川,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初三日。

⑭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40-5-010,寄谕察哈尔八旗都统乌尔图纳逊著召集受灾地方旗人喇嘛诵经乞,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40-5-012,寄谕察哈尔八旗都统乌尔图纳逊著令苏尼特受灾各旗诵经乞雨,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初二日。

设立喇嘛祭拜山川。根据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记载,清政府每年都在博克达山、格登山等处举行祭祀仪式,但在伊犁地区却无此惯例。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月,乾隆帝认为,伊犁地区有高山大川,也应祭拜。于是,令伊犁将军明瑞“于伊犁地方应行祭祀之高山大川,每年俱行祭祀”^①。

二、伊犁藏传佛教堪布喇嘛三年一换

堪布,即寺院住持,是伊犁藏传佛教界级别最高的喇嘛。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伊犁地区的堪布喇嘛原则上由清政府从北京雍和宫喇嘛中选派,也可经中央政府批准后,在伊犁当地“遴选经典好者奏补”^②。从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相关记载来看,该政策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开始有重大变化。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月十三日,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奏请:现任伊犁堪布喇嘛阿旺吹喇克喇木扎木巴三年期满后,所遗之缺,能否从伊犁喇嘛内“简选娴熟经文之贤能者补放”^③。乾隆帝寄谕索诺木策凌和伊犁将军伊勒图:一是阿旺吹喇克喇木扎木巴尚未年,暂不必更换。二是阿旺吹喇克喇木扎木巴三年期满时,须不须仍由京城派喇嘛之处,再行定义具奏。^④由此档案记载可知,伊犁堪布喇嘛期满三年需要更换是明确的,而候补人选是由伊犁当地喇嘛中择优而出,还是从京城中选派,暂时没有定论。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二月,伊犁将军伊勒图上奏:考虑到伊犁堪布喇嘛阿旺罗布藏阿喇木巴三年期满,建议“其缺仍请遣委四十四年更换返回之堪布喇嘛阿旺吹喇克喇木扎木巴”^⑤。关于伊勒图的建议,清政府考虑到:“阿旺吹喇克喇木扎木巴虽好,但自伊犁返回才仅三年,现已授为热河布达拉庙住持,不可复行遣派”。^⑥由谁补缺,则是交给章嘉呼图克图^⑦择优推荐大喇嘛,经清政府批准后担任伊犁堪布喇嘛^⑧。根据此档案史料记载,可以知晓伊犁堪布喇嘛期满三年一换的定例,反映出伊犁堪布喇嘛人选产生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二月,伊犁将军保宁奏报,伊犁普化寺堪布喇嘛罗卜藏楚木皮勒已满三年,请照例由京城另派喇嘛更代。清政府此时认为“原定条例有欠妥之处”^⑨,具体情况是伊犁距离北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0-1-002,寄谕伊犁将军明瑞著伊犁地方亦照蒙古之例设立喇嘛并祭拜山川,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初三日。

② (清)格臻额著,吴丰培整理:《伊江汇览·坛庙》,载《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4~25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4-069,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著堪布达喇嘛满三年后再定是否更换,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4-069,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著堪布达喇嘛满三年后再定是否更换,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6-2-116,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著择大喇嘛以补期满堪布喇嘛之缺,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6-2-116,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著择大喇嘛以补期满堪布喇嘛之缺,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⑦ 章嘉呼图克图,清政府封藏传佛教呼图克图(转世活佛)之一,总管内蒙古喇嘛事务。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6-2-116,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著择大喇嘛以补期满堪布喇嘛之缺,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40-3-005,寄谕伊犁将军保宁著普化寺堪布喇嘛三年期满尚不必更换,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京甚远,往返需以年为计。况且,“喇嘛系出家之人,身居何处,无甚不同,倘若众蒙古倾心宾服,喇嘛亦情愿留彼,则无须另行调换喇嘛,永行居住即可”^①。在此之前,四川堪布喇嘛罗布桑扎木阳颇得信众认可,三年期满后信众恳请连任,清政府将其赐号为札萨克班第达,永留彼处。参照此例,乾隆帝寄谕伊犁将军保宁:“堪布喇嘛罗卜藏楚木皮勒在彼处,众蒙古等俱倾心宾服,……伊亦情愿久留彼处,则准留伊犁,永住彼处,若伊不愿留彼,欲回京城,今则毋庸更换,即留满五年后,再奏请调换。”^②据此可知两点,一是堪布喇嘛期满三年一换不只是适用于伊犁地区,在其它地区藏传佛教界也是通用的。二是清政府改变了堪布喇嘛期满三年一换的定例,变成两种可选之法:如果当地信众信服且堪布喇嘛自己愿意留在当地,可以“永住彼处”^③;如果不愿意,期满五年后再行调换。

三、土尔扈特部修建佛寺庙宇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不仅修缮了伊犁地区原有的固尔扎、海努克等庙宇,还准许土尔扈特部在喀喇沙尔(今焉耆)、哈布齐海等地修建佛寺庙宇的请求。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二月,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拟在喀喇沙尔建寺造佛,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奏报,“所需知晓工程造佛之人,现乌鲁木齐兵丁内难以通融差派。”^④清政府考虑到“乌鲁木齐等地方无匠役”^⑤,即将此事交予陕甘总督勒尔谨抽调数名能建寺造佛之匠人前往。匠人沿途所需由勒尔谨处“拨给养赡其家口、沿途应得之项”^⑥。到达喀喇沙尔后,这些匠人只负责指挥修建,建寺造佛“凡用砍木运土等工人,应照常用土尔扈特人”^⑦。匠人们的工钱一概由渥巴锡处酌情用羊只支付,不可官办。倘若匠人“仍需稍增拨米石”,则由喀喇沙尔办事副都统达色处“将彼仓米通融拨给亦可”^⑧。同年三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就土尔扈特部建寺造佛一事寄谕喀喇沙尔办事副都统达色再次强调:“匠人等到彼动工时,除由渥巴锡等酌情以羊只准折工钱外,倘有不敷之处,则仓有多储之米,酌办增拨,即有应拨给工钱银之项,则分半拨给亦可,勿毫浮冒。”^⑨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40-3-005,寄谕伊犁将军保宁著普化寺堪布喇嘛三年期满尚不必更换,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40-3-005,寄谕伊犁将军保宁著普化寺堪布喇嘛三年期满尚不必更换,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40-3-005,寄谕伊犁将军保宁著普化寺堪布喇嘛三年期满尚不必更换,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2-005,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著从内地差匠役在渥巴锡游牧建寺造佛,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初八日。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2-005,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著从内地差匠役在渥巴锡游牧建寺造佛,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初八日。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2-005,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著从内地差匠役在渥巴锡游牧建寺造佛,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初八日。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2-005,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著从内地差匠役在渥巴锡游牧建寺造佛,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初八日。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2-005,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著从内地差匠役在渥巴锡游牧建寺造佛,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初八日。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2-011,寄谕哈喇沙尔办事副都统达色著以仓储米石增拨给建寺匠役人等,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据满文档案《达色奏从内地指派工匠为渥巴锡游牧地修建庙宇折》^①记载可知,此次从内地派遣匠人共计六人,渥巴锡给匠人的工钱标准是:“六名工匠合计每三日一只羊。”达色按当地价格折算后,每名工匠每日工钱为六分余银,略有不足。达色请示酌情为每名工匠每日各增加三分工钱、一斤干粮面。

此外,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四月,据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报:“照料渥巴锡游牧之侍卫官保,会同渥巴锡勘察,可于哈布齐海地方建寺,其佛殿、喇嘛等之住房、间数,绘图报来询问。”^②乾隆帝同意了渥巴锡在哈布齐海建寺的请求,同时寄谕伊勒图:“俟竣工后奏闻,仍赏寺名发去。”^③由此可以断定,对于土尔扈特部奏请建造的寺庙,清政府应有赐名的惯例。马大正先生在《卫拉特蒙古史纲》中曾写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达色协助渥巴锡在喀喇沙尔修建的寺庙,理藩院曾敕赐“普福寺”匾额。^④

四、土尔扈特部进藏熬茶

进藏熬茶,是我国信奉藏传佛教诸民族的一项重要宗教活动,是对到西藏礼佛布施、晋谒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活动的通俗称呼。土尔扈特部信奉藏传佛教,关于土尔扈特部派人进藏熬茶一事,满文档案记载较多。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带领下举部东归。翌年七月,土尔扈特渥巴锡、舍棱等人向清政府请示欲派人赴藏礼拜达赖喇嘛,并请求“官为办理,差员护送一事”^⑤。对于当时蒙古各部进藏熬茶一事,一向都是由蒙古各部请示清政府得以批准后,进藏熬茶具体事宜皆自行承担,清政府没有官办的惯例。但是考虑到土尔扈特部归附时间尚短,“一切尚未习惯,而又系初次派人”,乾隆帝决定“格外施恩,令由官为派遣”,但同时也明确强调“下不为例”^⑥。

从现有满文档案史料记载来看,这是土尔扈特部东归祖国后第一次请求进藏熬茶。清政府非常重视土尔扈特部进藏熬茶之事,在同意其请求的同时,也特别重视相关事宜。此时,乾隆帝一是考虑到舍棱“现为车布登扎布所属,并非舒赫德所属”^⑦。特别交代要将此事告知车布登扎布、渥巴锡、舍棱,使其知晓其中关系。二是考虑到“从前杜尔伯特车凌乌巴什等遣人赴藏,并未官办,今舍棱等派人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译编:《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36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2-014,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著即于哈布齐海地方建寺,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2-014,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著即于哈布齐海地方建寺,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④ 马大正、成崇德:《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3-6-042,寄谕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等土尔扈特初次派人赴藏准官办护送,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3-6-042,寄谕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等土尔扈特初次派人赴藏准官办护送,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3-6-042,寄谕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等土尔扈特初次派人赴藏准官办护送,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赴藏官为办理,车凌乌巴什等必有耳闻”^①。一方面让车凌乌巴什知晓此事,一方面乾隆帝也告知此事缘由,即“今舍棱等派人赴藏礼拜达赖喇嘛,姑准官为办理差往,乃因此等人由俄罗斯来归时,窘迫已极,且安置驻牧以来,尚未习惯,故由官办差遣,此乃大皇帝之鸿恩。”^②同时也明确强调,“此亦系初次,如此官办,下次毋得照此,亦如尔等自力前往。”^③

关于此次进藏熬茶的具体情况,满文档案《哈密办事大臣明起等为赴西藏熬茶土尔扈特人返回哈密并分别前往各处游牧事奏折》有详细记载。根据这份奏折可以知道此次土尔扈特部进藏熬茶的时间、人数、路线、沿途供给等重要信息。在时间上,众人于当年冬季从各自游牧处出发,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三月初五返回哈密。在程序上,土尔扈特部进藏熬茶须到京城由理藩院核定办理相关手续后,由理藩院官吏带领土尔扈特部众一起前往西藏。在人数上,土尔扈特部共派遣35人,在哈密至京城途中以及在京城期间“出痘者亡九人”“因病留于京城者一名”^④,实际上土尔扈特部只有25人能前往西藏。进藏路线具体是:众人从各自游牧处出发,先抵达哈密,之后前往京城理藩院报备,然后离开京城前往西藏。返程路线则是由西藏出发,经成都抵达哈密,再从哈密返回各自游牧处。往返沿途所需马匹行粮具体情况是:各自游牧处至哈密这一段路程往返所需均由土尔扈特部自行承担。哈密—京城—西藏—成都—哈密之间往返路程所需均由官方承担,具体标准是:“四人合给官车一辆,其所食口粮,按照伯克随从人员之例拨给。”^⑤那么入觐伯克的费用标准是多少呢?据史料记载:“头目每名日支京升粳米八合三勺,跟役每名日支京升粟米八合三勺,如以米面兼支,日支米四合一勺五抄,白面半斤或炒面半斤,头役每十人给羊一只,每名日给茶叶五钱,酥油五钱,菸(即烟)三钱,烧酒一两。”^⑥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七月,土尔扈特部第二次请求进藏熬茶。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等呈请派200余人进藏熬茶,同时给策伯克多尔济、奇哩布等念经。该请求被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驳回。乾隆帝肯定了惠龄的做法,认为:“内、外札萨克等,若有派人赴藏熬茶之事,亦不过百人耳,向无派二百余人之例,且土尔扈特等归附数年,皆如朕之旧仆之人,理应知晓此例。”^⑦

关于此次进藏熬茶的相关情况,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记载的过于简略。但是其它满文档案中将其前因后果记载得非常详细。根据满文档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为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呈请派人拜佛延医等事奏折》记载,阿克萨哈勒此次请求进藏熬茶的理由是:由于上一次进藏熬茶时该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3-6-042,寄谕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等土尔扈特初次派人赴藏准官办护送,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3-6-042,寄谕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等土尔扈特初次派人赴藏准官办护送,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3-6-042,寄谕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等土尔扈特初次派人赴藏准官办护送,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④ 哈密办事大臣明起等为赴西藏熬茶土尔扈特人返回哈密并分别前往各处游牧事奏折,郭美兰:《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后赴藏熬茶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

⑤ 哈密办事大臣明起等为赴西藏熬茶土尔扈特人返回哈密并分别前往各处游牧事奏折,郭美兰:《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后赴藏熬茶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

⑥ 陕甘总督杨应琚咨为妥善照料年班回目入觐事,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微缩胶卷,595卷,8077-11)。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8-1-050,寄谕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著土尔扈特等就近请医及教习幼童经文,乾隆五十年七月初三日。

部落“牧人众贫困,未能进献物品、多派人前往”^①。经过这些年休养生息,现在“各项牲畜孳生繁多”,故而“有近二百人情愿自备资斧赴藏,进献伯勒克于达赖喇嘛叩谒,为已故策伯克多尔济、奇哩布等念经、众人祈福”^②。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认为,进藏人数过多,如果同意,一则一旦土尔扈特部其他汗、王听闻后也按此人数请求进藏熬茶,担心“难以照料周全,致生事端”^③。二则先前该部落派5人进藏,有2人出痘身故,如今多人行经内地,惠龄担忧倘因不耐酷暑,致使人多病故、马畜折损。惠龄依此驳回了阿克萨哈勒进藏熬茶的请求。

据满文档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等为遵旨准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酌减人数入藏熬茶事奏折》可知,同年八月二十八日,阿克萨哈勒拟将进藏熬茶人数减少到四五十人。至同年十月,阿克萨哈勒最终将人数确定为39人^④。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土尔扈特部共有两次请求进藏熬茶。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记载了土尔扈特汗策璘纳木扎勒等派人进藏熬茶事宜,但是,据满文档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永保等为护送土尔扈特亲王车凌乌巴什赴藏熬茶人等起程事奏折》可知,土尔扈特部亲王车凌乌巴什也有派人进藏熬茶的请求^⑤。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举兵侵袭西藏。此时清政府正忙于在西藏清剿平乱,伊犁将军保宁欠缺考虑,同意了土尔扈特汗策璘纳木扎勒等派人进藏熬茶的请求。乾隆帝知晓后,认为当下局势不宜进藏熬茶,寄谕西宁办事大臣奎舒:待土尔扈特部人员到达西宁后,告知其西藏现在形势,不宜前往,暂时返回原游牧处,待平定兵乱之后,再择机前往。“倘若土尔扈特等尚未抵达西宁,即派通蒙语之妥员,速行往迎土尔扈特等,将朕此旨明白晓谕,令其就地返回游牧。”^⑥同年闰四月,驻哈密办事塔琦在没有接到西宁办事大臣奎舒通知的情况下,自行判定将“赴藏熬茶之伊犁、喀喇沙尔之土尔扈特、和硕特等”“令回各自游牧”^⑦。

通过此事,乾隆帝令伊犁将军制定土尔扈特等蒙古各部进藏熬茶章程。关于该章程,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记载简略,但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闰四月的满文档案《伊犁将军保宁为遵旨拟定土尔扈特和硕特等人赴藏熬茶习艺事宜章程事奏折》中有详细补充,具体章程是:“嗣后土尔扈特等若呈请派人赴藏熬茶,已逾十年,则准遣往;若在十年内,则驳回不准;其遣往人数,各游牧统共不得超过百人;

①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为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呈请派人拜佛延医等事奏折,郭美兰:《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后赴藏熬茶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

②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为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呈请派人拜佛延医等事奏折,郭美兰:《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后赴藏熬茶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

③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为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呈请派人拜佛延医等事奏折,郭美兰:《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后赴藏熬茶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

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为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赴藏熬茶等事奏折,郭美兰:《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后赴藏熬茶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

⑤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永保等为护送土尔扈特亲王车凌乌巴什赴藏熬茶人等起程事奏折,郭美兰:《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后赴藏熬茶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41-1-009,寄谕西宁办事大臣奎舒著将赴藏熬茶之土尔扈特即行遣回,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41-1-013,寄谕驻哈密办事塔琦等赴藏熬茶之土尔扈特遣回游牧一事办理甚妥,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十三日。

其留藏习经者,由台吉之子弟、众喇嘛内,挑其聪慧英俊者,不得超过二十人遣往。”^①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土尔扈特汗霍绍齐、亲王车凌乌巴什、郡王车凌德勒克、贝勒默们图,和硕特贝勒特恩特克等所派之人及堪布喇嘛等所遣喇嘛等进藏熬茶。关于此次进藏熬茶,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没有找到相关记录,但根据满文档案《西宁办事大臣特克慎为赴藏熬茶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途经青海返回情形事奏折》《伊犁将军保宁为赴藏熬茶土尔扈特和硕特等返回各自游牧事奏折》,可以知道进藏熬茶队伍于当年四月二十日前后从哈密起程,六月二十六日行抵西宁,九月初五通过多伦巴图尔。翌年熬茶事宜完成后,于三月二十二日从西藏出发,七月十九日抵达西宁,八月二十一日越过青头山,十月十六日返回各自游牧处^②。

综上可知,乾隆朝土尔扈特部一共五次请求进藏熬茶,其中三次成行,两次因廓尔喀侵袭西藏未能成行。

乾隆六十年(1795年),鉴于“蒙古游牧地域广袤,与钦差大臣驻地相距甚远者颇多,给发路票之例,难以尽知;且即便知有此例,亦因路途遥远绕行,不能逐一领票,亦未可料”^③,清政府对进藏熬茶章程进行重大改革,将“给发路票之例”调整为“赴藏之蒙古等,若十人以上者,即令领票遣往;十人以下,凡愿领票者给发外,倘若有无力领票者,亦听其便。”^④

五、土尔扈特部从西藏请教习、医师等事项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土尔扈特汗策璘纳木扎勒利用在京城觐见乾隆帝之便呈请理藩院:在其游牧处寺院内,“现有喇嘛千余名,而无教习经书之大喇嘛,于从西藏前来之呼图克图大喇嘛内赏一名教习经书。”^⑤理藩院没有受理,在驳回之时并将此事寄信告知伊犁将军伊勒图。待策璘纳木扎勒从京城返回驻地后,伊勒图严斥策璘纳木扎勒及其斋桑,主要原因在于策璘纳木扎勒越级呈请,不符合常规^⑥。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土尔扈特汗策璘纳木扎勒患病。从满文寄信档可以看出,乾隆帝对策璘纳木扎勒的病情非常关心。对于喀喇沙尔办事侍郎已行文伊犁延请医生,乾隆帝认为“理应就近速请其喇嘛额木齐(蒙古语音译,意为医生)诊治”^⑦。乾隆帝寄信福禄,一方面“令其立即延请好喇嘛额木齐诊治策璘纳木扎勒之病”,另一方面令其将当地喇嘛额木齐医治如何、伊犁医生等到后诊治如何的

① 伊犁将军保宁为遵旨拟定土尔扈特和硕特等人赴藏熬茶习艺事宜章程事奏折,郭美兰:《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后赴藏熬茶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

② 郭美兰:《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后赴藏熬茶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5-5-029,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著饬策璘纳木扎勒不可以琐事呈请具奏,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六日。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41-4-016,寄谕尚书松筠著将自定领取路票之例后赴藏人等数目之处查明具奏,乾隆六十年四月十八日。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5-5-029,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著饬策璘纳木扎勒不可以琐事呈请具奏,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六日。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5-5-029,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著饬策璘纳木扎勒不可以琐事呈请具奏,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六日。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6-2-016,寄谕喀喇沙尔办事侍郎著速报土尔扈特汗策璘纳木扎勒治病情形,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相关情况立即奏报^①。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七月,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请示能否趁进藏熬茶之便带上数名幼童前往西藏学经,待学经归来之际,请求达赖喇嘛派遣良医。关于“往请医师,并带幼童学经一事”,乾隆帝则认为:“伊犁等地亦有名医、大喇嘛,倘就近延请医师,并令幼童念经即可,亦可免去数人长途跋涉。”^②据满文档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等为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呈请派人赴藏拜佛延医等事奏折》记载,同年六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已经将此事奏报乾隆帝,惠龄认为,“查先前渥巴锡、奇哩布等呈请各自延请一名达喇嘛供奉,将军伊勒图皆钦遵皇上之训谕驳回办理,记录在案。”^③惠龄据此驳回了阿克萨哈勒之请,乾隆帝肯定了惠龄的做法。

综上所述,关于土尔扈特部请教习、医师等事宜,清政府基本遵循就近原则。关于蒙古各部送幼童进藏学经一事,在上述满文档案《伊犁将军保宁为遵旨拟定土尔扈特和硕特等人赴藏熬茶习艺事宜章程事奏折》中有明确规定,即,其留藏习经者,由台吉之子弟、众喇嘛内,挑其聪慧英俊者,不得超过二十人遣往^④。

六、禁止无名喇嘛聚集诵经、喇嘛流窜化缘

从现有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来看,清政府明确禁止无名喇嘛聚集诵经,明令禁止喇嘛私自流窜化缘等行为。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九月,奏报:“有一喇嘛自称格色喇嘛沙布朗呼图克图,已有十二代。”^⑤该喇嘛长期在阿尔玛泰河、库努依河等两地召集一千余人诵经。乾隆帝寄谕伊犁定边左副将军瑚图灵阿,令其查明该喇嘛究竟从何而来,是否是真的呼图克图。待查明真相后,“其应禁止者禁止之。”^⑥同时,乾隆帝明确要求:“嗣后,若有无名喇嘛等如集多人诵经者,则即禁止。”^⑦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甘肃省狄道州大佛寺逊朗素等八名喇嘛,从归化城同知处讨取路后,一路化缘至乌鲁木齐,在准备前往伊犁之时被伊犁将军伊勒图查获。后经查明,“此等喇嘛系三十八年由本寺外出之人,行至归化城后,向该同知讨取前往伊犁、乌鲁木齐等地路引。”^⑧有关此类状况,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6-2-016,寄谕喀喇沙尔办事侍郎著速报土尔扈特汗策琳纳木扎勒治病情形,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8-1-050,寄谕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著土尔扈特等就近请医及教习幼童经文,乾隆五十年七月初三日。

③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等为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呈请派人赴藏拜佛延医等事奏折,郭美兰:《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后赴藏熬茶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

④ 伊犁将军保宁为遵旨拟定土尔扈特和硕特等人赴藏熬茶习艺事宜章程事奏折,郭美兰:《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后赴藏熬茶满文档案》,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4-067,寄谕定边左副将军瑚图灵阿等著禁止无名喇嘛聚众诵经,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4-067,寄谕定边左副将军瑚图灵阿等著禁止无名喇嘛聚众诵经,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4-067,寄谕定边左副将军瑚图灵阿等著禁止无名喇嘛聚众诵经,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5-003,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著严禁内地化缘喇嘛到新疆各地行走,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十一日。

早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政府就明确规定:“归化城喇嘛有事前往厄鲁特、喀尔喀地方者,均令具题前往,都统不时稽察,毋须妄为。”^①由此可见,清政府是禁止喇嘛随处化缘游走的,尤其是前往厄鲁特、喀尔喀两地。

乾隆帝一方面严加申饬永庆在此事上的疏忽,一方面将“归化城同知交巡抚巴延三查明”,同时通谕陕西甘肃总督、山西巡抚、驻扎新疆各地大臣等和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将军、大臣等,“嗣后,如内地喇嘛等出境,则由驻扎该地方大臣等查明,换给路引遣往。至于此等化缘如同游方行乞之喇嘛等,严查出境,实力禁止。”^②

对于喇嘛的日常管理,乾隆元年(1736年)清政府就强调:“倘不给度牒,难以稽察约束。”^③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据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庆桂奏报,沙拉和洛苏(今新疆托里县老风口)驿站委笔帖式常禄查获路经托里布拉克安达拉驿站无执照之喇嘛劳藏萨木坦噶隆、伊什丹津格簇勒、沙喇布萨木巴格簇勒、萨木坦多尔济格簇勒、喀尔喀果木布等五人,审讯取供后,将情况上报定边左副将军巴图由其审理。乾隆帝下令让巴图详细查明劳藏萨木坦噶隆等无名无执照喇嘛以前“俱在何处隐居,近来皆行何等劣事,去伊犁时如何未报将军大臣之处”^④。针对无执照喇嘛随处游荡化缘一事,乾隆帝的态度非常明确,“此等化缘喇嘛等,游荡如乞丐,应严查力禁。”^⑤

同年五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庆桂奉旨查明,之前查获的喇嘛劳藏萨木坦噶隆等五人,“俱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徒弟,欲往扎萨克图汗部落省亲,并未禀报该管首领,不知如何前往塔尔巴哈台,从前并无劣迹”^⑥。乾隆帝在知晓缘由后,告知巴图、庆桂以后再有此类事情,“著由彼处照例办理”^⑦。

为何要禁止喇嘛前往各处化缘,在乾隆帝看来不仅仅是喇嘛是否有劣迹,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此数载以来,喇嘛弊端盛行,不专心佛法经学,一味谋财,凡大呼毕勒罕多为一家一族所据。”^⑧甚至由此诱发了廓尔喀举兵侵袭西藏。趁平定廓尔喀兵乱之机,乾隆帝决定“整饬喇嘛流俗”,严禁喇嘛四处化缘,特别是“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等均属新来归顺之人”,更不允许别处喇嘛到上述蒙古部落肆意化缘。乾隆帝并寄谕保宁、永保、蕴端多尔济、博兴、德勒克扎布,令其以后好生留意,如果一旦在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等各游牧地方发现前往化缘之喇嘛,“著据实速奏,断不可苟且完事”。^⑨

① 赵云田点校:《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4-5-003,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著严禁内地化缘喇嘛到新疆各地行走,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十一日。

③ 赵云田点校:《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5-3-017,寄谕定边左副将军巴图等著查明到处游荡化缘之喇嘛等有何劣迹,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日。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5-3-017,寄谕定边左副将军巴图等著查明到处游荡化缘之喇嘛等有何劣迹,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日。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5-3-036,寄谕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庆桂等著将喇嘛罗布桑萨木坦等照例办理,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5-3-036,寄谕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庆桂等著将喇嘛罗布桑萨木坦等照例办理,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41-1-047,寄谕伊犁将军保宁等著凡有喇嘛前往各处化缘之事作速具奏,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41-1-047,寄谕伊犁将军保宁等著凡有喇嘛前往各处化缘之事作速具奏,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此外,针对喇嘛偷盗牲畜该如何惩处,经查阅《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笔者并未找到具体规定。但是在《寄谕科布多参赞大臣明善著将盗驼之喀尔喀喇嘛绞立》这份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中找到了参照之法。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科布多参赞大臣明善奏报,关于喀尔喀喇嘛扎木巴勒多尔济偷盗杜尔伯特十驼一案该如何处理。乾隆帝怒斥明善:“前朕曾明发谕旨,令新疆地方盗马三匹,著绞立决。而似此盗驼十只之喇嘛,尚不立决正法,仍援前旨请旨,岂有此理。今马驼等牲畜视同一体,盗马三匹,尚立决正法,更何况盗驼十只者乎?(驼价尚贵于马价,此皆不知乎?)明善殊属糊涂。著寄谕严行申饬之。著将盗驼喇嘛扎木巴勒多尔济绞立决,以示儆戒。”^①由此可知,一是喇嘛偷盗看来不是偶然;二是有关处理办法,乾隆皇帝在此之前曾公开颁布处理办法;三是知晓处理办法是参照新疆地方盗马三匹及以上者为绞立决;四是将此盗驼案中的喇嘛扎木巴勒多尔济绞立决。此份满文寄信档最大的价值就是为我们提供了喇嘛盗窃牲畜的具体惩处标准。

七、小 结

从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看乾隆朝对新疆藏传佛教的管理,沿承了顺治、康熙、雍正对藏传佛教恩威并举的态度,同时又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调整完善,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地区藏传佛教的管理。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这些史料,既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了解这一时期新疆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变化,也给今天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供了历史启示。

[责任编辑:邢文娟]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档号:03-136-1-119,寄谕科布多参赞大臣明善著将盗驼之喀尔喀喇嘛绞立决,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Mongols and Tibetans, mixed with Hui, Han, Salar, Uyghur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it has formed a multiethnic habitat in the Qing Dynasty. After a long period of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various ethnic groups have formed a harmonious ethn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the changes of Mongo-Tibetan relations have very important impacts on the local society. The local relations between Mongols and Tibetans are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in Qinghai, especially afte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Lobsandanjin rebellion. Based on the reas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ongo-Tibetan relationship in Qinghai and Hena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ts further evolution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this paper shows the historical prosperity of exchanges between various ethnic groups, and provides some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YE CHAN..... LI Qinqu (035)

In Mongolian, the word Ejen means the master and even the monarch. It entered Chinese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nd its pronunciation is e zhan and e zhe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White Pagoda Temple, Liangzhou rebuilt the White Pagoda and erected a Han-Tibetan Tablet. In its inscription, the word ejen was borrowed into Tibetan language and recorded its sound as e cen, and then borrowed into Chinese from Tibetan language to write 也燁.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write Tibetan books in the Ming Dynasty, e chen. In the Tibetan language of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when the addressing object was the Mongols, the Mongolian e cen, e chen was used, and the old Tibetan mngav bdag (Master, owner) and other words were used to address the Wusi Tibetans. The Tibetan tablet of White Pagoda Temple used e-cen to call Mongolia Kuoduan, which indicates its personal identit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master servant system at that time, and also shows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te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Language) and ethnic differentiation (Mongolian vs Yellow-eyed Peoples) between Tibet and Mongolia.

The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Manchu Archives on the Qing Chakhar Mongols, Xinjiang,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Contents and Values XU Jianying (041)

Chakhar Mongols' westward movement and its border defense were important measures for the Qing Dynasty to manage Xinjiang, and the relevant archives witnessed this very special period of history. The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Mongolian archives in Chakhar Mongols, Xinjiang in the Qing Dynasty has well published this batch of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with embodiment of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the authoritative translation an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style.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disclosed many historical contents of Chakhar Mongols' westward migration to Xinjiang,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depth studies of Chakhars' westward migr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Urga Gold Mine and Mongolian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ZHANG Shuai (048)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Manchu Mongolian alliance" and strengthening the rule of Mongols was a basic policy pursued by the Qing Dynasty since its founding. In the mining process of Urga gold mine, the Qing government always put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Mongolian princes and herdsmen in the primary position,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opinions of Mongolian people on mining, and once suspended the mine because of the Mongols' opposition. After the "Gengzi Incident", due to the need to bear huge war compensation, in order to obtain tax revenue and realize financial revenue, the mining of Urga gold mine had to be resumed. However, the Qing government still formulated a very complete constitution to ensure that it would not hinder the livelihood of Mongolian people.

Emperor Qianlong's Manage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in Xinjiang as Reflected in Manchu Letter

Archives GUO Yihai (055)

In the process of Jungarian suppression, the Qing Dynasty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daily manage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in Xinjiang. Manchu letter files of the Qianlong Dynasty mainly record the new

construction and repair of Tibetan Buddhist temples, the daily management of lamas and the Turghuts pilgrimage to Tibet. Th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provide a strong support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attitude and strategie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managing Tibetan Buddhism in Xinjia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urghut Mongols Traditional Dress Language ····· PAN Meiling(066)

Clothing language is a description or interpretation of clothing culture and a way to express people's deep passion of clothing. The traditional clothing of the Turghut Mongols, with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colorful freehand brushwork patterns, conveys a rich clothing language. However, as a member of many national costumes,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s style, tex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while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ethnical clothing language expressed by these patterns, designs, styles, colors, accessories, etc. behind its beauty and function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dress language of Turghut Mongols is still in need, and there is basically no relevant discussion or research tex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records of many years in the settlement of Turghut Mongols, and combined with the interview and investigation with traditional folk craftsmen, this paper makes some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on the language of Turghut dr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dress, with the expectation to provide some basic materials for a bett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Turghut traditional clothing culture.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Commemorating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Turghuts' Return to the East and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 (Alfira Momin)(07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ongolian and Kazakh Witty Youth Stories ····· Aliya Huvisgalt(078)

Folk tales are a for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widely used by the masses. In the course of long history, every people have created a deal of folk tales to reflect their own labor and social life, express their own thoughts and feelings. Mongolian people have the folk tale "Dalan Khudalchi" while Kazaks have "Orphan Eighty lies and Forty Lying Songs", both are witty tales respectively featuring typical characters. We here draw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comparative storytelling to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tales, focusing on content, plot, character, artistic techniques and national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Language Art in the Dramas by Ts. Oidov ····· Gowa(083)

Dramatic literature mainly unfolds the story through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characters, so the use of dramatic language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creation of the whole drama. The reason why Ts. Oidov succeeded in creating three classic female subject dramas, Tsolmon, Tuyaa and Solongo,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exquisite strokes and distinctive dramatic language. This paper discusses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dramatic language, personalized language and nationalized language, so as to summarize the dramatic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of Ts. Oidov female theme dramas.

On Essays in the Bayannuur Newspaper's Mongolian Edition ····· Khuryamal(089)

This paper takes the essays published in the literature special page of Bayannuur Newspaper's Mongolian Edition from its inception to 1990 as the main topic, trying to demonstrate its historic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modern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hree chapters and appendix. The first chapter mainly explai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special edition of Bayannuur Newspaper's Mongolian Edition. The second chapt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main contents and ideas of the essays by tak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 as the divide. The third chapt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value of the literary special edition essays,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ir con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modern literature. This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Mongolian modern literature. The appendix mainly shows the catalogue of essays published from 1958 to 1990.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studies essays, drawing on the methodology of Journalism and close reading of texts.